

西方

【未名社科读本·社会学】

社会学经典读本

(上册)

Classic Readings in Western Sociology

谢立中◎编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91/202

:1

2008



【未名社科读本·社会学】

社会学经典读本 (上册)

Classic Readings in Western Sociology

谢立中◎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上下册)/谢立中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

(未名社科读本·社会学)

ISBN 978-7-301-13006-3

I. 西… II. 谢… III. 社会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993 号

声明:虽经多方努力,但仍未能与本书部分作者和译者取得联系,请相关著作权人
尽快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部联系,我们将向您支付稿酬。

书 名: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上下册)

著作责任者:谢立中 编

责任编辑: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006-3/C·046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69.5 印张 1133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0.00 元(上下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未名社科读本》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向来致力于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为国家人才培养服务,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出版了许多高品质的优秀教材和优秀学术著作,并因此而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2005年始我们陆续推出了《未名社科菁华》几个系列的学术精品丛书,荟萃了社会科学几个重要领域的知名学者和教授的代表性作品,以此来见证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成果,为今后我国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发展指引方向。现在,我们在上述精品书系的基础上,推出一个同样具有高品质但更注重学术多样性和普及性的读本书系——《未名社科读本》,旨在从更宽广的角度向更广大的读者(重点是高校师生)展示社会科学诸学科的丰富内涵。以经典读本的形式出现,目的在于使之成为广大师生学习和钻研社会科学诸领域知识的经典蓝本,品读之、吟诵之、三思之,无论课上课下,时时开卷有益。

为此,我们根据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教学特点,选择重点课程,分别延请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和教授,包括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优秀教员,遴选经典文本,加注精彩提要,汇编成册,并经我们精读加工后正式出版。此书系的特点是:

注重经典性——所选文本都是本学科领域的必读经典,涵盖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

注重实用性——从高校教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照顾到一般性的教学计划安排,每册长短尽量可以满足一个学期的教学要求;

注重时代性——所选文本充分反映社会科学发展的背景条件和时代特征,并具有一定的学术导向意义;

注重可读性——所选文本针对高校师生的阅读口味,做到学术规范、文笔晓畅,真正有利于延展读者的知识面,为课堂教学提供文献保障,为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

该书系也按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分为几个子系列,目前主要涉及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公共管理与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书系,向广大读者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弘扬和传承社会科学学术文化,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学术事业,始终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图书出版的崇高追求。我们呼吁广大读者在阅读使用这些读本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的编者将会尽心竭力,不断修订,去芜存精,力争与读者合力打造出更多的经典读本。

目 录

第一编 古典社会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003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节选)	马克思/007
《共产党宣言》(节选)	马克思 恩格斯/015
《论实证精神》(节选)	A. 孔德/025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二版序言(节选)	E. 涂尔干/051
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	E. 涂尔干/061
《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	E. 涂尔干/081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节选)	E. 涂尔干/104
论“理想类型”	M. 韦伯/132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	M. 韦伯/149
《社会学基本概念》(节选)	M. 韦伯/160
《共同体与社会》(节选)	F. 滕尼斯/187
社会学的问题	G. 齐美尔/205
社会如何是可能的	G. 齐美尔/225
《普通社会学纲要》(节选)	V. 帕累托/241

第二编 现代社会学

《社会行动的结构》平装本序言	T. 帕森斯/289
----------------------	------------

分析的实在论	T. 帕森斯/299
行动体系的单位	T. 帕森斯/319
《经济与社会》(节选)	T. 帕森斯 N. J. 斯梅尔瑟/326
论社会学的中层理论(节选)	R. 默顿/356
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范式	R. 默顿/369
宏大理论	C. W. 米尔斯/381
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	R. 达伦多夫/401
《社会冲突的功能》(节选)	L. 科塞/411
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	G. C. 霍曼斯/427
社会交往的结构	P. 布劳/444
《心灵、自我与社会》(节选)	G. H. 米德/463
论符号互动论	H. 布鲁默/480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导言	E. 戈夫曼/499
现象学与社会科学	A. 许茨/512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M. 霍克海默/535
文化工业	M. 霍克海默 T. 阿多尔诺/573
论新功能主义	J. C. 亚历山大/608
社会系统的自我再制	N. 卢曼/619
一个冲突分析的范式	J. 雷克斯/641
社会科学的解释重点	J. 科尔曼/661
社会世界的建构	P. 贝格尔/682
结构化理论要点	A. 吉登斯/701
认识与旨趣	J. 哈贝马斯/733
行为的基本概念	J. 哈贝马斯/748
理论理性批判	P. 布迪厄/766
《文明的进程》序言(节选)	N. 埃利亚斯/772

第三编 后现代社会学

话语的秩序	M. 福柯/787
两个讲座	M. 福柯/811
现代性的规范内容	J. 哈贝马斯/831
后工业社会面面观	D. 贝尔/854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	D. 贝尔/875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导论	S. 拉什 J. 厄里/892
理解我们的世界	M. 卡斯特/908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节选)	J. F. 利奥塔/931
《象征交换与死亡》前言	J. 布希亚/952
影像与模拟(节选)	J. 布希亚/958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节选)	F. 詹明信/975
时空压缩和后现代的状况	D. 哈维/984
《现代性的后果》(节选)	A. 吉登斯/1005
《风险社会》序言	U. 贝克/1018
知识分子:从现代的立法者到后现代的阐释者	Z. 鲍曼/1025
是否有一门后现代的社会学	Z. 鲍曼/1031
《流动的现代性》前言	Z. 鲍曼/1050
社会学理论的终结	S. 塞德曼/1064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学	C. 勒梅特/1083

第一编

古典社会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

内容提要 本文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对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表述,是了解马克思社会学理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作者简介 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和领袖。主要著述有《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

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

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参考阅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R. 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91—135页,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G. A. 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节选)

马克思

内容提要 从混沌的、表象的具体现实出发,经过分析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至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再回过头来,从某个最简单但又最核心的抽象规定开始,经过一个从简单上升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进程,将这些抽象的规定逐渐综合成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逻辑方法。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当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

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

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

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而知了。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